

明 清 商 业

重新认识中国文化 加强明清商业史研究

胡 平

明清时代是中国商业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商业文化是一座非常值得挖掘的宝库（如晋商、徽商等各大商帮的商业文化内容就很丰富）。在明清社会经济史商业史研究领域，我国既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学者，也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这是我们研究的有利条件。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而要继承它，就必须首先研究它、认识它。因此，中国商业史学会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对于进一步深化包括明清商业文化在内的明清商业史的专业研究，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明清商业史的研究，我认为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明清商业史要认真反思，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众所周知，我们这次会议，是在香港回归祖国和党的十五大胜利闭幕的背景下召开的，意义十分重大。香港回归有个近百年的历史值得反思。香港的发展是香港人民奋斗的结果。香港的发展除受

战争影响较小和没有政治运动以及地理位置优越等环境因素而外，商业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香港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处，香港文化的中心是商业文化。有人说，香港的青年企业家已把商业文化吸收到骨髓里去了。说明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商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商业史必须重视商业文化的研究。党的十五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对建国四十多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发展进行认真的反思，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克服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我们研究明清商业史，也要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政策、环境、商业文化等等进行反思，要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之所以要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这不仅是由于考古的发现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不断前推和向黄河流域以外的不断扩展，而且明清时代又被认为是中国由封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萌芽时期，特别是以往人们对商业文化的作用重视不够。因此，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很有必要。中国的文化史与商业史是分不开的。

二、研究明清商业史要研究农民如何进入市场，参与商品经济活动。我主张明清商业史要研究农民经商、农商关系和农村市场。因为在封建社会，没有农民参与商品经济活动，就没有市场。西方人把农民破产、打破传统而进入城市，当作是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途径。而我国的情况则不同，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广大农民恋乡恋土思想甚浓。早在宋代农民参与市场活动就使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时代农民参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人数显著增多，从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驰名天下的晋商不大都是农民出身吗？其它商帮大体也是如此。而且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也不一定都要彻底打破传统，现在福建有个村庄的现代化就依托了传统，又怎么解释呢？最近山西经济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国村庄经济丛书》，我认为选题很好。总之，研究

明清商业史一定要研究农村市场和农民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

三、研究明清商业史要不断深化对明清商帮的系统研究。明清时代各大商帮及其商业文化的研究是明清商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开始。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后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进一步对各大商帮作深入而系统的全面研究，揭示明清商帮兴衰的原因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与此同时，也要研究各个商帮的商业文化，找出各商帮之间商业文化的共同点和差异，以便对明清商业史和商业文化进行全面的全面研究。明清时代，晋商雄居各大商帮之首，晋商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都很丰富，而且富有自己的特色。孔祥毅同志提出了“晋商学”概念，希望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商人研究中心更加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四、研究明清商业史要重视对海商和海外华裔的研究。明清时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转折时期，私人海上贸易发展迅速，形成了众多的海商集团，所以沿海地区的私人海上贸易问题很值得研究。当然，也要注意研究沿海商与内地商的区别。同时，明清时代中国商人移居国外的很多，海外华人不仅在经营上大都获得了成功，而且在科研上还有获得诺贝尔奖者，这说明了什么？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和素质是非凡的。他们在海外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撒切尔夫夫人甚至说，中国人个个都是企业家。所以，海外华裔的文化和艰苦创业的精神非常值得研究。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对于海外华裔的研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研究明清商业史要加强对明清商业文化的研究。商业文化是商业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贯串于整个商业史的全过程。在进一步深化明清商业史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明清商业文化的研究。既要重视明清时代的商品文化和商业伦理文化的研究；又

要重视商业环境文化和商业营销文化的研究。同时，对于地方性商人的商业文化特色也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总结。研究明清时代的商业文化，必须弄清商业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

六、研究明清商业史必须注意改进研究方法。要从明清时代的商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实际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要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角度、商业分工专业化的角度、商帮及地域的角度、专题研究的角度、比较研究的角度等等，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系统研究。要将个案研究和综合分析结合起来，将明清商业的各项专题研究同明清商业史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阐明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及其规律。

重新认识中国的商业文化，加强明清商业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商业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根植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我们要在实践中，以史为鉴，继承我国历史上商业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祝大会圆满成功！

（本文作者：胡平，男，原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

对研究明清商业史的 几点看法

吴承明

明中叶以后，商帮兴起。这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随着商帮兴起，社会习俗发生变化，文学风格发生变化，经济思想以至儒学思想发生变化。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傅衣凌先生。他在解放前就研究了徽州商人、洞庭商人、福建海商、陕西商人，但没研究资本最大、历时最久的山西商人。1955年傅先生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1956）成书时，他已论述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与封建制度对立的一种力量，明清商人资本“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若干历史前提”。以后，许多研究商帮的学者，就把它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傅衣凌一向重视社会史研究，晚年他提出《明清社会变迁论》（人民1989），指出：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发生一系列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乃至“叛逆思想”。但是，这些新的因素，包括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能正常发展，而是经历了一个“中断、夭折、再继承”的曲折道路，但总的看，并未背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

我很钦佩傅衣凌先生这个观点。在我看来，16世纪即明嘉万年间大商帮的兴起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近代化或

现代化（二者同义语）过程。我这样看有两条根据：一是马克思，马克思的现代化概念是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其起始点是在 16 世纪重商主义时代“特殊商人阶级的形成”，他是指脱离了手工业行会的、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他们造成城市间的分工，发展了工场手工业。同时引起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到 18 世纪下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出现了工业革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另一条是 John C. 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译本商务 1987）中所说。希克斯的现代化概念是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其起始点是 16 世纪“专业商人”的出现。专业商人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发生一系列的政治、法律、税制的改革和农业的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到 18 世纪晚期出现工业革命，转变完成。

我以为，嘉万时期兴起的大商帮，就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商人阶级”，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不过，比起西欧，他们还不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纯商人”。例如晋商，恐怕要从弘治五年废除开中纳粟后的内商算起，边商以及一些皇商、官商还不算。内商也不纯，有封建性。但不能夸大，当时西方商人也讲家族主义，也想讨封个男爵，有似我国商人买个顶戴。问题是，明清商帮的发展，并未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也未实现市场经济，没有现代化。傅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我以为，主要是因为入清以后，政治和经济上的逆流太多，一直不能出现制度性的变革。顺治的禁海迁边，康熙的紧缩政策、市场萧条，都是逆流。愈是盛世愈保守，乾隆是最大的保守派。兴文字狱，明末以来的启蒙运动全被扼杀；一口通商，拒绝马夏尔尼使团，闭眼不看世界。道光的市场危机，又是一次大的经济逆

流。所谓现代化，实际是制度变革，今称体制改革，逆流多，没有制度改革，就没有现代化。

我这种看法未必对，可批判。如果有点道理，那么，我再对如何研究明清商业史提点意见。

通常我们研究商业的发展，总是用再生产的理论。商品交换是再生产的必要环节，生产发展，交换也必扩大。这是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观点。马克思说：“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但在他论欧洲 16 世纪至工业革命的历史时，这个理论不适用了。我上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节，标为“交往与生产力”，即交换（广义的）引起生产力变迁。更明显是在《共产党宣言》。宣言说：原来的行会工业“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

历史上经济的发展是由生产或供给推动的，还是由交换或需求牵动的，从来就有争论。大体上，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是生产决定论，边际主义、凯恩斯主义则是需求决定论。今天还是这样，供应学派、合理预期学派强调供给，货币学派、制度学派强调需求。

我想采取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说生产和交换各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可称为经济发展的横座标和纵座标（《反杜林论》）。就是说，经济发展是由这两个座标管着的，有时是生产起决定性作用，有时是需求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研究商帮兴起的背景，总是收集很多明代生产力发展的材料，这是对的。但忽略了对社会总需求的研究。这方面，可参看（方坦纳欧洲经济史）的十六和十七世纪一卷。它就是首先讲总需求，又首先讲人口的增长和人口

迁移，这是需求的基础。又讲消费结构的改变，它改变需求。又讲欧洲内部的贸易，相当我们省际贸易，贸易能增加价值，即增加购买力，扩大需求。当然，在欧洲，那时主要是海外市场的扩大。

我再谈一点社会变迁和思想变迁，这是研究明清商业史必须考虑的问题。我曾有篇文章，讲徽商对改变社会风气的的作用，又说晋商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大。这是我的无知，错了。看张正明教授《晋商兴衰史》，有专节讲山西社会风尚的变化，还表列 23 个府州县的记载。社会风尚的改变除弃农经商、弃仕经商外，主要是奢侈。奢侈之风，除小部分可归之于生产发展，如绢价下跌和一些手工业新产品的出现外，主要是反映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以及消费倾向的改变。明代思想家已提到奢侈对扩大就业有好处，还有个陆楫，从分配上论奢能富国，有凯恩斯味道，这在当时真了不起。

明清思想，近来已有不少研究。从研究商帮的角度看，我以为应该抛开批判理学提倡实学这个框框。嘉万时的泰州学派、东林党人以及李贽，都是信奉王阳明的，但不妨碍他们激烈地批评时政，倡导新思想，重视商人。明清之交的启蒙运动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至颜李学派，确实有批判心学倾向，但这与他们提倡实学，抬高工商地位并无直接关系。雍正乾隆来个大逆流，独尊朱子，万马齐喑，有心人只好搞考证，却回到了汉学。嘉道以后，龚自珍为首，开展了更大一次启蒙运动，但他们却打出公羊学招牌，回到先秦去了。所以，应该打破儒学框框，专研究新思想。新思想或归之于重商主义，或归之于市民思想，我看都有点，但不能评价过高。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是有条件的，许多商业要严禁。倒是张居正的“厚商而利农”无意中说出商业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但他人本意仍只是“通有无”。

新思潮中，没有人领会到交换能创造价值，没有真正的重商主义。

（本文作者：吴承明，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深入开展明清商业史和晋商的研究

王相钦

中国商业史学会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经上级有关领导批准，今天在山西太原正式成立，我代表中国商业史学会表示热烈祝贺，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这个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是在尊敬的胡平会长直接关怀下成立的。此前，胡会长曾多次到山西考察、调查研究，这次又亲自到会讲话，指导工作，为会议增光添彩。为筹备这次会议，山西的同仁、特别是山西财经大学、山西省社科院的教授、学者付出了辛勤劳作，出版、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不但为明清专业史委员会的成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且也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搞好明清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本人对明清史的研究十分浮浅，这次参加会议主要是向各位专家学者学习、请教。明清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时期。明清时期，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制度开始由鼎盛转向衰败，同时，封建的自然经济、习俗经济也开始出现了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型的萌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转型至今还没有真正完成。因此，我们成立明清史专业委员会、加强对明清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 also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明嘉靖万历和清康熙乾隆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了

极盛时期，疆土开拓，人口增加，农业产量提高，手工业技术进步，商品流通扩大，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是，落后的封建制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农民起义难以突破封建制度的羁绊；拥有巨资的商人走的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路，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处于萌而不发的状态；封建统治者也没有应变、革新之策。“当变不变”，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停滞状态，致使在外国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面前束手无策，最终导致了近代的百年灾难，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山西是晋商的发源地，在山西开会，讲明清经济史，自然也不能不讲晋商。晋商在明清时期成长壮大，称雄商界 500 年，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大商帮，很值得认真探讨研究。近年来，山西的专家、教授的研究成果很多，我也见到不少，特别是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葛贤裴的《晋商与传统文化》、黄鉴辉的《山西票号史》、史若民的《票商兴衰史》以及李希曾的《晋商史料与研究》、张巩德的《山西票号综览》等力作，为晋商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另外，山西大地上现存的大量晋商大院、商号旧址、实物资料，大多基本完好，这是巨大的财富和资源，很值得开发利用。

我相信，明清专业史委员会的成立，一定能更好地团结和组织全国同仁，利用现有的良好基础，深入地开展明清史和晋商的研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作者：王相钦，男，北京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

——江南、广东、华中、华北四区域的比较

许檀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是明清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关于明清集市的研究，以日本学者加藤繁、山根幸夫等致力较早；60年代中叶，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使集市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七八十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农村集市的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涉及四川、江浙、安徽、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区。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各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笔者以诸多教益与启迪，并引起笔者的思考和探索的兴趣。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区域间的比较，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小生产者之间的贸易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

唐宋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坊市制度的废弛，草市、墟集贸易日渐活跃。除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之外，商人也开始涉足其间。宋代，已有不少墟市征收商税；还有一些草市、墟集更因交通便利、贸易繁盛，逐渐发展为镇市。

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嘉靖一万历年间，虽然各省区发展程度不一，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相当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明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间逐渐开始恢复。乾隆一道光年间农村集市的发展进入全面稳定的增长阶段，全国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均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山东增长在 20% 以上，广东、湖北超过 50%，四川、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新开发地区如东北三省集市也在迅速发展。笔者曾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各省区的研究，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了总体估算：明代嘉靖一万历年间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清代中叶，仅直隶、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浙江等 11 个省区的集市合计已有 18000 余个，若再加上河南、山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数字，全国集市总数至少可达 22000—25000 个；清末当会超过三万。^①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长，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清代中叶，全国大多数省区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农村集市网。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 100 平方公里 1—2 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 60—90 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 40—60 平方公里，山区则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 3—5 公里，山区多为 5—7 公里，平均约在 4—6 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 1—2 小时

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的多。

进一步的分析可看到，人口、耕地资源，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影响集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是由需求决定的，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保证这一需求的第一要素，但小农还必须有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才能使他的各项需求从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故一定数量的人口与耕地是维持一个集市最基本的条件。比较表一中平原区与山区两部分，平原人口密度多在每平方公里 200—300 人，而山区人口密度多在 100 人/平方公里上下，山区集市密度普遍低于平原区，人口稀少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气候、水源条件的差异，南北方耕作制度亦有不同。华北平原为旱作区，农作物大多一年一熟，部分地区为两年三熟；而长江以南各省均为稻作区，大多一年两熟，条件好的还可一年三熟。故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土地数量南北方也相差较大，北方旱作区大致在 3—4 亩，而南方只需 1—2 亩。当然土质、水源条件不同、商品化程度不同，同样数量的土地其实际收益仍会相差很多。这些因素都会对市场需求量造成影响。下面，我们来看各省区的差异。

表一 清代中叶各省平原、山区集市密度与人口、耕地资源对照表

地区别	平原区			地区别	丘陵山区		
	集市密度 集/100km ²	人口密度 人/km ²	人均耕地 亩		集市密度 集/100km ²	人口密度 人/km ²	人均耕地 亩
直隶保定府	2.35	172.24	2.65	直隶永平府	0.66	55.90	3.60
河间府	2.47	185.74	4.43	遵化州	0.70	130.06	2.69
山东济南府	2.49	271.27	2.82	山东沂州府	0.87	95.26	3.23
东昌府	2.29	295.79	4.80	登州府	0.73	103.94	3.57
兖州府	1.51	198.15	3.59				

续表

地区别	平原区			地区别	丘陵山区		
	集市密度 集/100km ²	人口密度 人/km ²	人均耕地 亩		集市密度 集/100km ²	人口密度 人/km ²	人均耕地 亩
江西九江府	1.06	208.66	1.34	江西赣州府	1.21	105.91	0.85
南康府	1.50	265.98	1.45	南安府	1.05	82.53	1.21
临江府	2.64	325.86	2.27				
广东广州府	3.53	306.84	1.87	广东南雄州	1.24	100.65	3.27
				嘉应州	0.56	146.01	0.92
江苏苏州府	1.96 *	1073.21	1.14				
松江府	2.69 *	626.57	1.54				

资料来源：详见拙作“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系市镇数。

华北平原河北、山东二省平原各府人口密度、耕地条件相差不多，其集市密度也大致相同；而位于丘陵山区的各府人口密度约为平原区的一半，土质、水源条件亦差，其集市密度较低也就是自然的了。

华中地区我们以江西为例。在江西各府中以临江府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为最高，其集市密度也高于其他各府；赣州、南安二府虽位于山区，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也低于其他诸府，但集市密度并不太低，这大概是由于这两府位于大庾岭商路，自乾隆 22 年清政府限定广州独口通商，江浙闽诸省的茶、丝等货均需经江西翻越大庾岭入广东出口，而进口货物也需由广东翻越大庾岭入江西再转销各地，商品转运及流动人口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这条商路沿线南安、赣州等府市场的发展。

广东各府中以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府人口密度最高，集市密度也是最高的，每 100 平方公里墟市密度为 3.5 个，平均每集

交易半径只有 3 公里，这一密度不仅在广东，即便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而粤北山区的嘉应州人口稀少，耕地条件也差，平均 200 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墟市；南雄州人口虽少，但耕地条件尚佳，而且位于大庾岭商道的广东一侧，其集市密度虽大大低于广州府，但与相邻的江西赣州、南安二府大体相同。

江南的苏州、松江二府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里人口密度最高，为平原区一般密度的 2—3 倍，耕地条件亦佳，但这里的集市密度并不是最高的。不过，这二府的数字是市镇密度，这一现象提示我们，集市的增长并非无限的，当它达到某一合理的购物距离之后，主要发展方向即可能转向另一个方面。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

明清时期，在集市数量增长的同时，集市开市频率也呈增长趋势。如福建邵武县和平墟、朱坊墟明代每月仅开市一次，到清代中叶都已增为每旬两集，即每月开市六次；永定县溪口墟，乾隆时每旬一集，道光时增至每旬两集。^②山东高唐州的州市、夹滩市明代每旬开市两次，清代康熙年间改为每旬三次。金乡县康熙年间共有乡集 19 处，其中每旬开市两次的 9 集，开市四次的 9 集，另有一集每旬只开市一次，总计每月开市 57 次；乾隆年间该县乡集增至 23 处，并全部改为“十日四集”，总计每月共开市 92 次。^③

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④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

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 109 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 60 个，占总数的 55%；每旬三市者 39 个，占 35.8%；每旬两市者 8 个，占 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⑤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⑥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如上引金乡县例子；在运河沿线亦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⑦

二、农村集市与商品流通

最迟在乾隆一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一流通网，几乎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都可与其他省区进行经济联系，它在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可供出售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加，粮、棉、布、绸、糖、茶叶、纸张等都成为集市中上市的大宗商品。小农赴集出售，商人赴集收买，从而形成繁盛的集市贸易；正是这些集市贸易中汇集的商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兹举要述之。

1. 粮食。清代，江南是最主要的缺粮区，每年从长江中上游输入的粮食至少有一千万石。湖南、江西、四川等省是主要的